

革命大纛護英華

一、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蔣介石集民國以來一切封建軍閥賣國獨裁之大成，把大片國土拱手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全力「圍剿」蘇區紅軍的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

宋慶齡針鋒相對，在積極進行抗日活動，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支援紅軍反「圍剿」的同時，大力營救被迫害的革命者和愛國志士。她猶如鬼魅橫行世界中的一桿大纛，護衛了中華民族眾多的優秀兒女，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參加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會議的二十四位共產黨人，在上海被捕。其中有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林育南、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李求實、中共江蘇省委委員何孟雄、上海總工會秘書長龍大道、中共南京市委書記惲雨棠，以及「左聯」的五位青年作家胡也頻、柔石、馮鏗（女）等。他們受盡酷刑，拒不屈服，在二月七日，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秘密分別活埋或槍決。這一暴行發生後，反動派一直封鎖消息。直

到四月份，共產黨人才從一個同獄囚人的口中得知詳情。為此，「左聯」發表了抗議宣言。魯迅也寫了兩篇追悼死者的文章。

宋慶齡在這年八月為母親喪事回國後不久，從史沫特萊處瞭解到這一事件的真相。她無比悲憤，強烈譴責蔣介石的暴虐行徑，並在與斯諾談話時憤怒地指出：「正是信奉基督教的委員長把我們最優秀的青年活埋了」；「他應該對所有的屠殺事件負責」，「他一背叛革命，就開始殺人。因此，只要他是國民黨政府的獨裁者，我就決不在其中任職；因此，如果他也算是個基督教徒，我就不做基督教徒。」²⁰⁵

同年十一月，鄧演達又遭秘密殺害，宋慶齡雖竭力營救但未成功。十二月十七日，再次發生大批屠殺愛國學生的「珍珠橋慘案」。為此，宋慶齡發表了《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的宣言，強烈譴責這兩樁罪行。

早在宋慶齡回國前兩個多月，即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所謂共產黨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牛蘭（Noulens）夫婦。牛蘭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公開的職務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辦事處」的秘書，機關設在上海，擔負著幫助中國和東亞各國革命的任務，主要工作是組織和資助中國的工人運動。牛蘭是這個機構的負責人，

他的夫人汪得利昂 (Gertrude Ruggs) 是他的主要助手。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叛變，供出共產黨的許多重大機密，牛蘭夫婦的真實身分暴露被捕，並很快被引渡給國民黨政府。一九三二年七月，牛蘭夫婦被押送到南京。他倆為抗議在獄中倍受折磨，曾進行三次絕食。七月二日，開始第四次絕食，以抗議不許他們聘請外籍律師出庭辯護。消息傳開後，上海各界著名人士立即開展營救活動。

營救牛蘭的計畫是由中共保衛部門同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上海站共同制定的，具體負責人是哈爾德·佐爾格²⁰⁶和中共中央委員潘漢年。營救活動以公開和秘密兩種方式進行。公開的就由宋慶齡出面。七月十一日，佐爾格通過史沫特萊邀集宋慶齡、楊杏佛、斯諾、伊羅生等三十二人組成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由宋慶齡任主席，史沫特萊任書記，在四川路設立辦事處，與國際援救牛蘭委員會合作，要求將牛蘭案移滬審理，或無條件釋放牛蘭夫婦。²⁰⁷

中外進步人士把營救牛蘭夫婦的希望，都寄託在具有崇高威望和特殊地位的宋慶齡身上。德萊塞等三十一名美國作家致電宋慶齡，懇請對牛蘭夫婦「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

206 佐爾格一八九五年生於俄國巴庫，幼年隨父母遷居柏林，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加入德國共產黨。一九二四年受共產國際委託，到莫斯科籌備國際諜報局，表現出驚人才華，工作出色，被勸說轉入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國籍，然後被蘇聯紅軍派來中國上海，一九三三年後，他被派往日本開闢情報工作，獲取大量戰略情報，為蘇聯掌握日本動向和後來制訂抗德衛國戰爭決策做出重大貢獻，一九四一年十月被日本逮捕，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被處以絞刑。後來蘇聯政府授予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雄」稱號。

釋放」；十餘位德國藝術家及十餘位教授也致電宋慶齡，懇請出面營救牛蘭，使其「惡劣情況有所減除及求得他的自由」；共產國際最著名的婦女領袖克拉拉·蔡特金以個人名義致電宋慶齡說：「因為你是偉大的孫逸仙理想的真實的承繼者，我希望你會熱心努力的援救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局的工作人員。」此外，著名版畫家珂勒惠支為首的十餘名德國婦女及法國的羅曼·羅蘭等，也都紛紛發出函電，請求宋慶齡營救牛蘭夫婦。

宋慶齡不負眾望，不辭勞苦地竭盡全力進行營救活動。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晨，她偕牛蘭夫婦的兩位辯護律師及一位親屬，同赴南京地方法院看守所探視牛蘭夫婦，並勸說他們進食。²⁰⁸第二天，她又親自找行政院長汪精衛及司法行政部長羅文乾等進行交涉。結果，由宋慶齡和蔡元培兩人具保，法院同意允許牛蘭夫婦移上海就醫，並定於十三日離開看守所。²⁰⁹但由於羅文乾認為這種處理「違背法治精神」而堅決反對，並以辭職相威脅。蔡元培擔憂會引起政治糾紛而撤回保證狀，「宋慶齡亦只得連帶退保，拂然而去」，²¹⁰另覓營救辦法。十七日宋慶齡再次到南京，探望牛蘭夫婦。當時，牛蘭夫婦已生命垂危。宋慶齡再次勸他們進食，指出在中國法西斯監獄中，「絕食」無濟於事，並會陷入反動當局慢性虐殺的圈套。後經宋慶齡與國民黨司法部門交涉，同意由她一人具保，准予牛蘭夫婦到南京鼓樓醫院就醫。牛蘭夫

208 《申報》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二日。

209 《申報》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

210 同上。

婦隨即同意停止絕食。

八月十九日，江蘇高等法院判牛蘭夫婦「死刑」，援照大赦條例，各處以「無期徒刑」。由於宋慶齡等中外人士的營救，暫時保住牛蘭夫婦的生命，粉碎了國民黨反動當局企圖虐殺和死刑的陰謀。但為了推倒「無期徒刑」的判決，營救活動仍繼續進行。八月二十五日，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等，再次致電國民黨政府，「請求特赦牛蘭夫婦」。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陳獨秀等人也被捕入獄。這時的陳獨秀雖已轉化為共產黨的反對派，成為中國託派的首領，反對中共農村武裝鬥爭的路線，但他的主要鋒芒是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並因積極從事這樣的活動而被捕。因此，宋慶齡對他也積極營救，並在十月三十一日親赴武漢，向蔣介石交涉。社會上和國際上也掀起營救陳獨秀的運動。蔣介石鑒於這種壓力，又考慮到共產黨反對派可資利用，就答應將陳獨秀案交法庭公開審理。²¹¹

從營救鄧演達、牛蘭夫婦和陳獨秀，抗議殺害共產黨二十四位烈士以及「珍珠橋慘案」等一系列的鬥爭中，宋慶齡認識到對反動派殘害革命者和愛國進步人士的罪行，不能僅停留在事後的譴責上，還應積極地多方營救，制止屠殺——特別是不經公開審理的秘密屠殺。而且，這場鬥爭，不能單靠個人及其他個別人來進行，應動員國內外一切進步人士共同奮鬥。

因為這是嚴峻的鬥爭，會遇到巨大的阻力，僅憑私人關係營救幾個人，「政府對此感到頭痛，社會上一些人也認為多事」，於是，宋慶齡從一九三二年夏季開始，就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人醞釀成立一個專門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營救政治犯的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簡稱「民保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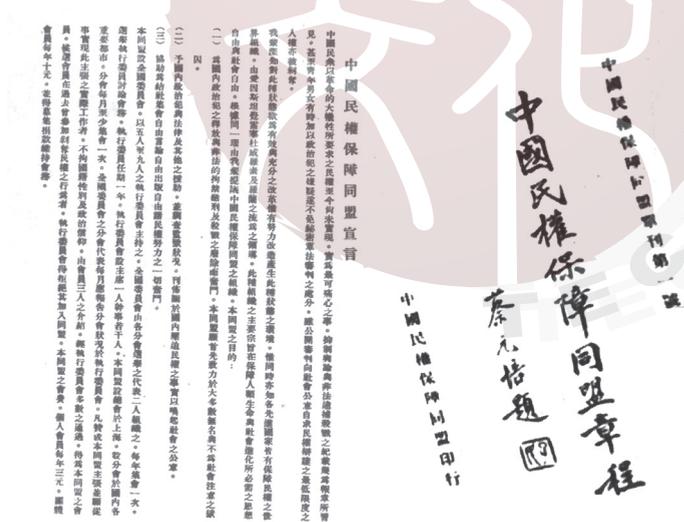
宋慶齡認為，這時成立這樣的組織，不僅必要，而且也有了可能性。因為「九一八」後抗日救亡成為全國人民最迫切的任務，反對國民黨獨裁，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鬥爭與抗日救亡運動發生了緊密的聯繫。要抗日救亡，必須給人民以起碼的民主權利；而抗日救亡，又為保障人權、營救被稱為政治犯的革命者和愛國志士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條件。事實上這些「政治犯」多是民族精英、抗日戰士。所以「民保盟」是一個革命的組織。宋慶齡說，該盟的目標是「建立中國的統一、獨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權利」。²¹²

另外，在營救鄧演達、牛蘭夫婦、陳獨秀等人的過程中，宋慶齡曾利用資產階級的法治觀念，據理力爭，並多次親自與國民黨當局甚至當面與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交涉，她體會到合法鬥爭及法治觀念在爭取輿論、團結群眾、打擊敵人方面的重要性。她決心充分利用自己的條件，把合法鬥爭和非法鬥爭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合法鬥爭的作用。因此，她終於揀起國民黨硬塞給她的「中央委員」的身分，開展民權保障同盟的組建工作。十月三十一日，她親

自去南京及武漢營救陳獨秀時，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資格，向國民黨中央提議組織一種特別委員會，專門處理政治犯事件，並向蔣介石徵詢意見，但建議沒有被採納。於是，「民保盟」就以民間組織的面目出現，依靠她和蔡元培等人的地位和聲望進行合法活動。

經過四、五個月的籌備，十二月上旬，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等人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籌備會」終於成立。

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宣言宣稱「這個同盟不是一個政黨」，是「無黨派性」的，「決不專為一黨一派的人效力」；效力對象也不受國界的限制，不論哪一國人，一視同仁；吸收盟員也只視其「贊成本同盟主張，並願從事實現此主張而進行實際工作者，不拘國籍、性別及政治信仰」。這就表明同盟是不參加政黨活動而只爭民權的組織，並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樣便於廣泛爭取社會同情，有利於發展組織，便於在國民黨統治下開展合法鬥爭。但這絲毫也不影響它實際上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宣言及章程。

進行的革命工作，恰恰相反，由於巧妙地把合法與非法鬥爭高度地結合起來，更便於開展營救政治犯的工作。因為當時獄中的政治犯，尤其是「同盟首先致力」的「大多數無名與不為社會注意的獄囚」，主要是從事革命活動的像共產黨人那樣的革命者和主張抗日的愛國者。關於這一點，宋慶齡心中最清楚。她在發起組織同盟時致外報函中，就明確表示，由於當時社會上只注意營救陳獨秀，不提同時被捕的帥孟奇、陳善甫、朱鏡我等真正的共產黨人，「更未追論恐怖時代犧牲之鬥士。余擬參加組織一團體，專以保護及營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時被犧牲者為職志」。²¹³

經過幾天緊張的籌備工作，十二月二十九日，宋慶齡和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南京路華安人壽保險公司大廈舉行「民保盟」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宣佈由籌備會選舉產生的「民保盟」臨時執行委員會名單：主席宋慶齡、副主席蔡元培、總幹事楊杏佛、宣傳委員林語堂等。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臨時執行委員會主持同盟的工作。

宋慶齡在招待會上號召新聞界同人和民權保障同盟的盟員們應該並肩站在一起，共負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使命，為那些擁塞在監獄中的大量無名無告的政治犯「主持正義」。她鼓勵新聞界堅強而勇敢地「在輿論方面興起一個有利於自由和正義的潮流」。²¹⁴

「民保盟」宣告成立後，迅速得到社會各界的回應和支持，魯迅也應蔡元培的邀請而加入。

213 北平《民國日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

214 《宋慶齡選集》第六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三三年年初，上海的盟員已發展到三十一人，其中有宋慶齡、蔡元培、楊銓（楊杏佛）、林語堂、史沫特萊、王雲五、鄒韜奮、胡愈之、魯迅、周建人、茅盾、郁達夫、王造時、鄭太朴、班樂夫、Georgen Barney等。

在吸收盟員時，宋慶齡考慮到「民保盟」鬥爭的尖銳和殘酷，而同盟的主要任務又是營救共產黨人，為了保護共產黨員，決定主要只吸收有名望有影響的非共產黨人參加。因此，她曾勸陳翰笙不要加入同盟，以免受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迫害，但希望他幫助「民保盟」做一些具體工作。²¹⁵

民權保障同盟從成立到一九三三年六月該盟總幹事楊杏佛被國民黨暗殺而停止活動，僅



與民權保障同盟委員胡愈之（左二）、魯迅（左一）合影。

215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格》，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按：陳翰笙於一九二五年在北京由李大釗介紹給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秘密加入共產國際，做地下工作，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共產國際農民研究所工作一年，結識宋慶齡，一九三三年公開的身分是受聘於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主持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工作。

存在半年時間，但做了大量工作，除了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配合（如營救牛蘭、廖承志、陳賡、鄧中夏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之外，主要是靠同盟主要領導人宋慶齡、蔡元培的崇高威望和政治膽識。鄒韜奮後來回憶：「正是由於蔡元培、宋慶齡二人出任正副會長，才使得該同盟的力量更為增加，在國際宣傳上更為有力。」²¹⁶當時中國特務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勾結租界當局，英美的政治民主雖然並不徹底，但還比較重視「法治」。「民保盟」把國民黨反動政府迫害進步人士的伎倆加以揭露，雖然會增加租界當局的麻煩，但他們不得不受理。此外，「民保盟」還常常根據事實，直接向有關當局交涉。特別是由蔡元培、宋慶齡親自出面交涉後，他們就不能不認真考慮和對待了。

民權保障同盟活動的另一個特點，是善於利用中國半殖民地及由此而產生的國民黨政權「崇洋恐外」的弱點，以外文為鬥爭武器，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充分發揮國際友人和進步勢力支援中國人民的威力。「民保盟」中央執行委員胡愈之在回憶該盟一般的工作程式時說，我們每次開會，都有美國記者參加。宋慶齡、楊銓（楊杏佛）等講英語，所有報告大部分是用英文寫的。所發表的向國民黨抗議的宣言，主要是靠史沫特萊、伊羅生及其他外國記者，用電報發到外國。當時西歐、美國的著名進步人士如肖伯納、愛因斯坦、羅曼·羅蘭等，便根據這些材料簽名發表致國民黨反動派的抗議和宣言，並在國外報上登出，對國際輿論影響很

大。國民黨反動派對此感到極大的麻煩。 217

在這方面，既是同盟骨幹、又是外國記者的史沫特萊、伊羅生等人，對同盟工作的幫助是很大的。中國人民永遠懷念他們。

二、緊張的營救活動

「民保盟」是在反對國民黨政府法西斯統治的鬥爭中誕生的，從籌備會見報（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之日起，就投入了戰鬥，而且一場接一場地連續戰鬥，經歷了一段艱險的歷程。

（一）營救中共北平地下黨破壞時大批被捕的抗日愛國師生。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後，華北成為救亡前線。中共在平津地區積極發動抗日救亡運動，黨的組織及週邊組織發展較快。一些參加「教聯」的敢說敢為的大學教授，如北京大學的許德珩、北平大學法學院的侯外廬、師範大學的馬哲民等，積極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經常應各大學學生會邀請，前往各校講演抗日救亡的道理，宣傳馬克思主義。蔣介石唯恐當時張學良主持的北平軍政當局對局勢控制不力，對鎮壓救亡運動手軟，於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派他的侄子、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蔣孝先率憲兵三團進駐北平。自此，非法拘捕、殺戮不斷出現。十二月，廣州起義紀念日到來前，蔣孝先就根據南京

中央黨部命令，實行秘密大逮捕。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等大批進步師生，都被逮捕或綁架。宋慶齡等得知許德珩等被捕消息後，立即設法營救。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她與蔡元培、楊杏佛、黎照寰、林語堂五人，以籌備會名義致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蔣介石、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和北平、天津衛戍司令於學忠，要求釋放被非法逮捕的許德珩等北平師生。電文中譴責當局「摧殘法治，蹂躪民權」，指出：「欲求全國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諸自由，嚴禁非法拘禁人民、檢查新聞。」²¹⁸電文充分體現了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而向國民黨政府要求民主權利的合法鬥爭的原則。

與此同時，宋慶齡又派楊杏佛（楊銓）去北平具體進行營救工作，向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張學良當面交涉，並在許德珩夫人勞君展的陪同下，到獄中探望許德珩等人。

張學良與宋慶齡的關係一直不錯。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在北平患病時，張學良曾前往探視。

一九二九年宋慶齡從歐洲歸國參加奉安大典，張學良派夫人于鳳至到瀋陽車站迎接，並在私邸親切會見。一九三一年宋母去世，張學良又特派于鳳至到上海弔唁，並陪伴宋慶齡。這些給宋慶齡留下美好的印象。張學良一向十分欽佩宋慶齡的為人，所以對這次她親自出面營救政治犯，自然是要認真考慮的。加以「九一八」事變以後，張學良集國恥家仇於一身，但由

於蔣介石對日本採取不抵抗政策，使他不能報仇雪恥，思想正在起變化。同時，他也懼怕開罪北平教育界，懼怕有「五四」傳統的北平學生罷課，鬧得局面不可收拾。因此，趁「民保盟」營救之機，就順水推舟，立即將許德珩釋放。許德珩隨即在楊杏佛的動員下，參加同盟北平分會的籌備，並被選為執行委員。「民保盟」在鬥爭中誕生，又在鬥爭中壯大。

「民保盟」創建伊始取得的第一個勝利，給予該組織和人民群眾很大的鼓舞。他們再接再厲，繼續營救北平政治犯的工作。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宋慶齡和蔡元培以「民保盟」正、副會長身分，再次致電北平公安局長鮑毓麟，要求「將全體師生即予釋放，以重公意而保民權」。²¹⁹三十一日，鮑毓麟回電說明傳訊各校師生系奉中央命令辦理。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宋慶齡、蔡元培據鮑毓麟的答覆，及許德珩所揭露的北平獄中情況，致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揭露北平師生被拘禁全系國民黨中央一手所操縱，並且「未依法審判，亦不釋放，於黨義法治，實有未合」。²²⁰電文矛頭直指國民黨最高當局。

由於以宋慶齡為首的「民保盟」的營救和北平各校「被捕師生後援會」的鬥爭，大部分被捕師生陸續獲釋。他們後來都成為「一二·九」運動的骨幹。其餘的被捕者，如侯外廬、馬哲民，雖被以「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的罪名各判兩年半徒刑，但懾於輿論壓力，

219 許德珩：《高風亮節，大義凜然——記宋慶齡同志》，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220 《申報》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

北平反動當局也不敢將他們作為「共黨首要」押解南京；不到一年，他們也都被同志們營救出獄。²²¹

(二) 繼續營救牛蘭夫婦。

牛蘭夫婦被判刑後，受到更加非人的待遇。他們任何起碼的要求都得不到解決，患病也不給治療，反動派妄圖用這個辦法把他們拖垮。牛蘭夫婦再次絕食，反動派不予理睬。牛蘭夫婦再次處於絕望和死亡的邊緣。他們委託宋慶齡派來探望的伊羅生起草遺囑，並要求「將他們兩人六歲的小孩吉米 (Jimmy) 交托孫夫人撫養」。²²²

「民保盟」成立後，宋慶齡領導援救牛蘭委員會和「民保盟」兩個組織，繼續進行營救活動。她從瑞士請來律師，並請陳翰笙在她與瑞士律師之間傳遞信函。²²³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宋慶齡和楊杏佛、沈鈞儒、吳凱聲到南京視察監獄時，特地探望牛蘭夫婦，詢問他們的生活情況。²²⁴她還多次派馬海德大夫到獄中探望牛蘭夫婦，並為他們醫治疾病。馬海德帶著宋慶齡的介紹信，以醫生的身分，可以和他們談話，告知外面的和有關他們兒子的情況，鼓舞他們的鬥志。牛蘭夫婦入獄後，無人照顧的小吉米由伊羅生領交宋慶齡撫養；她把他安排在一個

221 參見侯外廬：《偉大的戰士，偉大的母親》，載《文匯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222 《中國論壇》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

223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格》，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二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224 《申報》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

外國人家裡，並囑託馬海德關心和照料這個孩子的生活。²²⁵直到「民保盟」被迫解散後，宋慶齡也沒有放鬆營救牛蘭夫婦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她從廬山避暑後回滬，路過南京，特地前往監獄探望牛蘭夫婦，並要求監獄當局對他們悉心照料，不准虐待。由於宋慶齡等國內外進步人士的支持，牛蘭夫婦在獄中堅持鬥爭，終於在次年年底日本佔領南京時，乘機越獄，然後去了蘇聯。

（三）視察北平監獄，營救劉尊棋等。

一九三二年底，中共地下黨員、塔斯社及《世界日報》記者劉尊棋等因從事抗日救亡運動被捕，拘留在所謂「反省院」的北平陸軍監獄，受盡各種折磨，已有一年多時間。劉尊棋從被買通的看守員那裡，看到帶進來的破報紙，得知上海成立以宋慶齡為主席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消息後，和同獄的中共重要領導人薄一波、劉瀾濤等商量，擬寫信給宋慶齡揭露獄中殘酷迫害政治犯的情況，並呼籲改善待遇和出獄參加抗敵鬥爭。經獄中支部同意後，他以「北平軍人反省院政治犯」名義寫出兩封英文信，一封揭露獄中政治犯的黑暗生活，一封請求釋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由看守員寄發。信中痛陳這些愛國青年「個個帶著幾公斤重的腳鐐，鎖在牢房裡，飲食十分惡劣，缺醫少藥，不得看書讀報，迫切要求釋

225 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偉大的形象：親切的友情》，載《中國建設》一九八一年八月。

放出獄，上前線抗敵救亡；關在獄中時應該受到合乎人道主義的政治犯待遇」。²²⁶宋慶齡收到信後，極為重視，要英文秘書史沫特萊登記備案，並提交同盟執委會討論。決定派楊杏佛利用赴北平成立同盟北平分會的機會調查北平監獄實況，進行營救活動。

楊杏佛在北平參加北平分會成立大會後，偕分會主席胡適和執行委員成舍我訪問張學良，轉達宋慶齡的要求。張學良即派外事秘書王卓然陪同他們三人視察監獄。視察時，楊杏佛用英語對劉尊棋說，他是奉孫夫人之命來視察北平政治犯監獄的，「我們知道你們無辜。我們一定促請當局改善你們的待遇」。王卓然也用英語對劉說了幾句話，表示要盡力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

視察結束前，楊杏佛還要求王卓然向天津軍政當局轉達宋慶齡關於舉行政治犯大赦、釋放愛國青年的要求。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民保盟」舉行記者招待會，宋慶齡簽發了劉尊棋寫的兩封信。接著，英文《大陸報》和中英文合刊的《燕京報》刊載了這兩封信。同年五月底，蔣介石派他的親信何應欽掌握平津軍政大權，張學良在奉命「出洋考察」之前，從外事秘書王卓然的報告中得悉宋慶齡派楊杏佛視察監獄並要求釋放一些愛國青年之事尚未了結，當即簽批了王卓然的報告，劉尊棋等於三十日終於獲釋。²²⁷

226 劉尊棋：《慶齡同志，感謝你的救援》，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227 同上。

一九四四年夏，劉尊棋在重慶的一次酒會上遇到宋慶齡，對於因她的營救而獲釋一事深表感激，宋慶齡謙虛地微笑說：「那可不是我個人的力量。」²²⁸在這件事情上，張學良的外事秘書王卓然也有功勞，人民沒有忘記他做過的好事，解放後他被聘為國務院參事。

（四）營救陳賡、廖承志、羅登賢等。

陳賡曾參加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在進軍廣東的戰鬥中負重傷，左腿的脛骨和腓骨折斷，後轉輾流亡到上海，經共產黨的幫助住進牛惠霖骨科醫院。牛惠霖和牛惠生兄弟是著名骨科醫生，是宋慶齡的表兄弟。當時宋慶齡非常關切地囑咐牛氏兄弟，一定要千方百計醫好陳賡的腿傷，也要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所有從南昌起義部隊下來的傷病員。在宋慶齡的關照下，牛氏兄弟竭盡全力把陳賡已被接歪的傷腿重新接好，保住了殘肢，使他得以繼續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英勇奮戰了三十餘年。²²⁹

一九三二年秋，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參謀長的陳賡，又在反「圍剿」的戰鬥中負重傷，再次到上海得到牛氏兄弟的精心治療，很快痊癒。但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即將返回蘇區的前一天，由於叛徒出賣而被捕。另一位化名陳賡的妹妹陳藻英的工作人員也同時被捕。他們受盡折磨，堅貞不屈。巡捕房一位原同情革命的探長將情況秘密通知共產黨後，宋慶齡受共產黨的委託又進行營救。

²²⁸ 劉尊棋：《慶齡同志，感謝你的救援》，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²²⁹ 傅涯：《良師益友，革命情深——深切悼念宋慶齡同志》，載《解放軍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傅涯是陳賡夫人）。

幾天之後，二十八日，中共全國總工會上海局書記羅登賢、余文化和中共全國宣傳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廖承志也因叛徒出賣而在法租界被捕，與陳賡關押在一起。

廖承志被捕後，佯稱願供出另一同志的行蹤以換取開釋，由兩個法國巡捕陪同來到何香凝住宅，把被捕消息巧妙地告訴給母親。何香凝當即致電全國軍政長官進行營救，並因悲憤過度而病倒。宋慶齡聞訊後親赴何宅慰問，同何香凝談了很久，表示要出面營救。²³⁰ 她與蔡元培邀請上海著名律師吳凱聲負責辦理此案，並召集「民保盟」臨時執委會議，商議營救羅、廖、陳等人的辦法。

同月三十一日，在國民黨政府要求下，租界法庭雖未獲任何證據，仍判決羅登賢等五人引渡給中國當局。宋慶齡為此發表強烈抗議，痛斥「中國政府與帝國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壓迫中國人民的反帝抗日戰士」。同時，高度讚揚羅登賢等是「中國的反帝戰士」，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是「中國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並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堅決鬥爭，「反對當局繼續迫害這些已經在領導鬥爭的革命戰士」，要求釋放他們，要求不能使他們遭受酷刑與死亡。²³¹

在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等人的營救下，廖承志在引渡前，首先獲釋。

230 《申報》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231 宋慶齡：《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載《宋慶齡選集》第六十八至七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宋慶齡逝世後，廖承志在他寫的紀念文章中，²³²回憶他獲釋後同宋慶齡在他家一次帶有傳奇色彩的見面：廖承志從上海工部局拘留所回家後，一天，宋慶齡突然隻身出現在何香凝家的客廳裡，使廖家母子十分驚異，因為他們知道這時候宋慶齡是不輕易出門的，更不會事先不打招呼就一個人上門來。何香凝慌了，趕快去沏茶，宋慶齡卻平靜地同她寒暄，一面向廖承志眨了眨眼。何香凝有些明白了，就托詞去拿糖果而回避了。當客廳裡只剩下廖承志和宋慶齡時，她的臉色變得凝重，說話放慢，但清晰、簡捷，每句話像鐵一樣沉重。她說：「我今天不能待久。」並說她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廖承志探問後，她解釋是代表「共產國際」。她問廖承志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廖承志回答了問題。「好，只有十分鐘。」宋慶齡微笑著，從小皮包裡摸出一根香煙吸著，然後起身到何香凝屋子裡去了。

廖承志飛快地把叛徒名單寫在一條狹長的紙上交給宋慶齡。她打開小皮包取出一根香煙，把它上半截的煙絲挑出來，再將那個紙條卷好塞進香煙，然後放回皮包裡。廖承志怔怔地望著宋慶齡，她從容地站了起來說：「我自己下去，不用送了。」廖家母子不知說什麼好，宋慶齡淡淡地一笑，有把握地說：「不要緊，安全的。」然後慢步下了樓梯，走過廚房，就出了何香凝家的大門。²³³

232 參見廖承志：《我的回憶之二》，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233 同上。

這件事，再次表明了宋慶齡與共產黨及共產國際不尋常的關係，和她那諳練的地下鬥爭藝術。

廖承志獲釋後，羅登賢等四人被引渡給中國當局，押解到南京，營救工作更加困難。為防止他們被反動派秘密殺害，四月二日，宋慶齡與蔡元培致電汪精衛和羅文幹，指出一「罪證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屬違法，務望力爭，由正式法庭審判，勿用軍法刑訊，以重民權而保司法獨立」。汪於第二日覆電中允諾將「依法辦理」。

同日，「民保盟」臨時執委會與上海分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派宋慶齡、楊杏佛、沈鈞儒、伊羅生四人赴南京進行營救工作。五日，在他們下榻的揚子飯店，宋慶齡接見來訪的汪精衛和羅文幹，以「民保盟」的名義向他們提出四項要求：（一）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二）廢止濫刑；（三）給予政治犯閱報讀書之自由，禁用鐐銬及改良獄中待遇；（四）嚴懲獄吏敲詐犯人及受賄行為。²³⁴

當晚，宋慶齡率領的「民保盟」代表團就到蘇州監獄探望陳賡等人。由於特務頭子張某在場，宋慶齡在與陳賡談話時，受共產黨委託，投給他一張紙條，陳賡馬上用腳踩上。²³⁵就這樣接通了獄中陳賡、羅登賢等人與黨的關係。

234 《申報》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

235 宋慶齡一九七八年八月給中共上海地委的信，轉自張珩：《「老人年」回憶宋慶齡》，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輯，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由於「民保盟」的積極營救，敵人未敢驟然加害陳賡。蔣介石曾千方百計勸誘這位優秀的黃埔學生、紅軍的高級將領「悔過」。蔣介石甚至親自召見他，要他出任師長。陳賡冷笑說：「不做你的狗官，共產黨員不像你們這批狼心狗肺的東西……要打就打，要殺就殺，對我不要有任何幻想。」蔣介石惱羞成怒，準備殺害了事。宋慶齡聞知後，指責蔣介石說：「陳賡是黃埔軍校的學生，東江之役一直跟著你打仗，你打了敗仗還是陳賡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現在你要殺他，簡直是忘恩負義。你天天說的禮義廉恥哪裡去了？」蔣介石被宋慶齡罵得無言對答，只得讓她把陳賡帶走。²³⁶

羅登賢營救無效，同年八月二十九日被秘密殺害。犧牲前，這位二十八歲的共產黨人慷慨陳詞：「我個人死不足惜，全國人民未解放，責任未了，才是千古遺憾！」²³⁷

（五）營救鄧中夏。

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曾領導一九二二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和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一九三三年，他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國革命互濟會黨團書記，在上海領導地下鬥爭，五月十五日，在法租界被捕。

宋慶齡受共產黨的委託進行營救。她請律師史良到家中，要求她為一個叫施義的被捕者

236 廖夢醒：《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但據陳賡夫人傅涯說，陳賡是這年的五月，在其他同志協助下逃脫，隨後找到了黨，被派往中央蘇區的。

237 《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中羅登賢的名字將永遠是光輝燦爛的》，載《中國論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辯護。史良後來回憶說：「孫夫人一見我就熱情地握住我的手，她那美麗而嚴峻的面色深深感染著我，給我以信心和勇氣。她講話簡短、明確，態度沉著、鎮靜，眼光堅定、柔和。她告訴我，要積極營救一位革命志士。他的名字叫施義（即鄧中夏——引者注）。」宋慶齡還一再囑咐她，做律師的要多注意為被捕的革命者和進步人士進行辯護，使正義得到伸張，使革命力量得到保護。

史良為了辦好這件事，找了她的一位老師，共同商定了一個策略，就是首先在法庭上提出要求，不許移提犯人。因為鄧中夏涉嫌被捕是在法租界內，按照慣例，在法租界內的案件，應在法租界內解決，如能作出不許移提的裁定，就可以利用法租界內比較嚴格的資產階級法律程式來對受害者進行保護。結果第一審就獲得勝利。²³⁸當時黨組織也派人與巡捕談妥，準備花幾百元把鄧中夏營救出來。眼看營救就要成功，不料與鄧中夏一起被捕的互濟總會的援救部長兼對外聯絡杜玲英被引渡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後，把鄧中夏出賣了。²³⁹反動派得知施義就是鄧中夏。於是，蔣介石親自下令，把鄧中夏強行引渡到南京，不經審判就殺害了。

營救失敗了。史良說：「但從這個事情開始，我卻和人權保障運動開始了接觸，繼續從孫夫人那裡接受許多案件，營救了不少同志。」

238 史良：《深切懷念宋大姐》，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史良：《人民的事業必勝——沉痛悼念尊敬的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239 鄭紹文：《互濟總會與鄧中夏》，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鄭當時任互濟會宣傳部秘書長。

除以上所述的重大營救活動以外，宋慶齡領導「民保盟」還做了其他許多保障民權，抗議迫害無辜、營救被捕者的工作，其中包括接受共產黨的委託營救中共「左聯」黨團書記丁玲、中共中央文委書記潘梓年、中共中央委員黃平等。同時，宋慶齡還積極參加國際上保障民權、營救被迫害的政治犯的鬥爭。

總之，無論哪裡，只要有非法逮捕、侵犯人權的事，宋慶齡就向哪裡伸出援救之手。

三、怒斥胡適

由於「民保盟」的矛頭直接指向蔣介石法西斯獨裁統治，特別是反對他的反共政策，因此引起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極端不滿。雖然同盟在醞釀成立時，他們懼於宋慶齡的嚴正立場，或許還不瞭解同盟成立後如何活動，一時沒有嚴禁。但覺察到它一誕生就直接威脅其統治權威時，就不再容忍，並向「民保盟」的北平分會首先開刀。

北平分會成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主席是胡適。但它還未開展工作，就遭到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的干涉。二月二日，北平報紙紛紛刊登市黨部致市政府、公安局的信函，誣衊「民保盟」北平分會為「非法組織」，要他們不要接受該分會任何請求。

「民保盟」對北平市黨部的干涉和誣陷堅決給予回擊，蔡元培、郁達夫（上海分會執行委員）分別發表談話和文章，批駁所謂「非法」之說。但是胡適卻在壓力面前發生動搖，最後竟至完全背叛。

胡適與楊杏佛視察北平監獄之後，二月四日，他給蔡元培、林語堂寫信，對宋慶齡簽發劉尊棋寫的揭露監獄黑暗的信「真感覺失望」，並顛倒黑白地說，他們去監獄調查時並沒有一位犯人說及有任何私刑和吊打。更惡劣的是，他還著重對直接處理劉尊棋來信的宋慶齡、史沫特萊進行攻擊，說什麼：「上海總會似應調查此種檔的來源，並應考據此種檔的可信程度。若隨便信任匿名檔，不經執行委員會慎重考慮決定，遽由十二人私意發表，是總會自毀其信用，並使我們親到監獄調查者，蒙攜出或捏造此種檔的嫌疑。」五日，當他看到報紙上刊登該兩份檔後，又給蔡元培、林語堂寫信，武斷地認為控訴書是「捏造的」，指責宋慶齡「不加考察、遽信為真」，釀成「大錯」，並威脅說：「如果十二私人可以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那麼，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²⁴⁰與此同時，他又向幾家報紙寫信和接見記者，散佈這些三言論，甚至露骨地表白「對政府逮捕政治犯，並不是無條件的反對」。

對胡適的這種態度，「民保盟」內部反應不一：林語堂表示支持；蔡元培、楊杏佛起初曾致函胡適，擺事實，講道理，進行規勸，以調和矛盾「謀團結」，並證明史沫特萊確曾將控訴書提交集體討論，「故此文若不宜由本會發表，其過失當由本會全體職員負責，決非十二人之過，亦決非十二人擅用本會名義之結果」，²⁴¹駁斥了胡適把矛頭指向宋慶齡「十二人」的錯誤。

240 胡適致蔡元培、林語堂函，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241 蔡元培、楊杏佛致胡適函，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但是，胡適不聽規勸，繼續發表文章公開反對「民保盟」提出的「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口號，甚至站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立場上無恥地說：「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²⁴²「民權保障同盟不應該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一個政府為了保衛它自己，應該允許它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²⁴³

至此，胡適完全撕下其保障「民權」的偽裝，露出保障「政府權」、「鎮壓民眾權」的真面目。同盟大多數成員對胡適的背叛行為表示憤怒，拍案而起，奮起反擊。二月二十二日，同盟致電胡適，指出其完全違背同盟成立三大任務中的第二項：「為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一切酷刑及蹂躪民權之拘禁殺戮之廢除而奮鬥。」要求胡適澄清事實。二十三日，楊杏佛代表同盟執委會致函胡適，譴責其「對外公開反對會章」，「批評會務」，「為反對者張目」，二十八日，宋慶齡和蔡元培再次致電胡適，提出最後警告：「釋放政治犯，會章萬難改變。會員在報章攻擊同盟，尤背組織常規，請公開更正，否則惟有自由出會，以全會章。」²⁴⁴但胡適對同盟的警告置若罔聞。

胡適在當時社會上有較大的影響，與蔡元培、楊杏佛等私交也很深，讓他出任「民保盟」北平分會主席，原來對他是寄予很大期望的。但是宋慶齡等人不講情面，在對敵鬥爭的緊張

242 《民權的保障》，載《獨立評論》第三十八號，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243 胡適向記者的談話，載《字林西報》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244 宋慶齡、蔡元培致胡適電，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刻，對其錯誤行為進行堅決鬥爭，終於在三月三日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通過了魯迅提議的開除胡適的決議。十八日，又召開全體會員大會，再次聲討胡適違反會章的行為，追認執委會關於開除其會籍的決議。

這一事件，表明宋慶齡在領導「民保盟」進行工作時，既注意團結大多數，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又堅持高度的原則性，維護同盟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宋慶齡專門為此事件發表一篇長文，闡述「民保盟」的堅定原則，指出：「由於本同盟不是一個政黨，它的行列可以容納一切真誠支持我們的鬥爭要求的人們。但是那些幫助政府壓迫人民或為這種壓迫辯護的人們，在本同盟中是沒有立足餘地的。本同盟也不容留那些只是軟弱地『批評』政府個別專橫殘暴的行為，而實則擁護那整個壓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並支持國民黨——地主、資本家、豪紳和軍人的政黨——鉗制民主權利的人們。」她嚴厲批評了胡適的兩面派嘴臉：「胡適身為同盟的盟員，又是北平分會主席，竟進行反對同盟的活動，他這種行動是反動的和不老實的。胡適是同意了同盟所發表的基本原則才加入同盟的。但當國民黨與張學良公開反對本同盟時，他害怕了起來，並且開始為他的怯懦尋找藉口和辯解。本同盟清除了這樣一個『朋友』實在是應該慶賀的，同時還要盡力防止類似事件及破壞再發生，在這許多基本原則上，我們只有絕對團結，不能容許動搖。」²⁴⁵

245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任務》，載《宋慶齡選集》第五十六、五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該書說此文寫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有誤。胡適被開除是一九三三年三月，故此文寫作不得早於此時。

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和胡適的背叛，北平分會陷於瓦解。原擬議中的南京、天津、武漢、廣州等地分會，也未能建立起來。所以同盟的全國代表大會一直未能召開，最高權力機關也始終是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

四、痛悼楊杏佛

宋慶齡等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領導「民保盟」臨時執委會和上海分會不避艱險地進行的一系列營救活動，透徹地揭露出國民黨統治的法西斯性質，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反動集團。因此，國民黨反動派對同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起先，他們給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發出恐嚇信，並在信中裝著子彈進行威脅。但宋慶齡等絲毫不為所動。繼之，又威脅上海各個公共場所不准借地方給「民保盟」開展活動，最後連「民保盟」經常租用的上海八仙橋青年會也拒絕提供活動場所了。但宋慶齡等千方百計與敵人周旋，使同盟的活動得以照常進行。有一次，宋慶齡和魯迅，蔡元培等在上海市區內秘密召開一次民權保障同盟的會議，以反對國民黨對進步人士的迫害。然而，會場被特務發現，他們便改在黃浦江上一條大船上召開，但又被特務跟蹤上了。最後，宋慶齡等果斷地把會址改在海凌天主教堂，開會時間定在凌晨三時。這次，他們終於順利地開了三個小時，到早上六時會議才結束。會後，蔡元培、魯迅等隨同宋慶齡回到寓所時，「每個人臉色都有點蒼白，卻流露著興奮和勝利的神情，並沒有

有倦意」。²⁴⁶

反動派屢遭失敗，就惱羞成怒，決定對同盟的領導人下毒手。但對於宋慶齡，他們還有所顧忌，蔣介石指示殺掉一個「適當」的人來對宋慶齡進行威嚇。於是，他們選定了楊杏佛。楊杏佛歷史上一貫堅決反蔣，同情共產黨，是同盟中的中堅分子，主持實際工作的總幹事。蔣介石把這個任務布置給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軍統前身）頭子戴笠。

戴笠從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間開始策劃殺害楊杏佛的方案。據當時戴笠的親信沈醉回憶：第一個方案是準備在滬西近郊區大西路中山路一帶進行狙擊。因為楊杏佛經常在那一帶騎馬。特務們正在進行狙擊楊杏佛的準備時，蔣介石表示不同意這麼辦，因為把楊杏佛暗殺在租界以外的地區，既達不到威嚇宋慶齡的目的，還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責，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煩。他「堅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慶齡的寓所附近執行，這樣既可顯示特務的力量，威脅宋慶齡先生，又可以不負破案責任。戴笠只好改變計畫，決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進行布置，準備趁楊杏佛外出散步或去宋慶齡寓所途中執行」。負責執行暗殺的是復興社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參加這次行動的六個特務，行動前都舉行了宣誓，表示「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應即自殺，而不能洩漏出去，否則將遭到嚴厲制裁。²⁴⁷

楊杏佛從南京到滬的朋友處得知特務要殺害自己的警告，聯繫近期他先後接到的許多恐

²⁴⁶ 區愷烘：《在宋慶齡同志身邊十七年》，載《羊城晚報》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區愷烘是當時宋家的服務員。

²⁴⁷ 沈醉：《軍統內幕》第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嚇信，覺察到暗殺已不僅是一種恐嚇，而是正在策劃了，但他早已作好用「自己的膏血換取人民光明」的準備，因此毫不畏懼退縮，仍然繼續進行工作。早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在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楊杏佛曾發表過一首詩曰：

人們，你苦黑暗麼？

請你以身作燭。

用自己膏血換來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担

同志們，我累了！

但是不敢後退。

與畏縮落伍的行屍做伴，

還情願和被創的戰士在血泊中僵睡。

這次，他對妻兒家人講述自己將會遇到危險時說：「即使我遭到不測，你們也會有人照顧的。」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卻十分關心宋慶齡的安全。犧牲前兩天，他到宋慶齡的寓所警告說，在接到的恐嚇信中，有幾封把宋慶齡的名字也列在就要受到恐怖狙擊的名單中。宋慶齡告訴他：「我也接到許多類似的恐嚇信——常常是用最下流的話寫的。」她還叮囑他

「自己也務須小心」。²⁴⁸兩人都只關心對方的安全，情義感人。想不到這竟是宋慶齡與楊杏佛的最後一次會面。

六月十八日，楊杏佛與兒子楊小佛坐汽車由法租界亞爾培路（今上海陝西南路）三三一號中央研究院外出，剛出大門，即遭潛伏特務狙擊。在這生死關頭，他自知不免一死，但為救兒子，立刻用身子袒護小佛，所以特務們連發十多槍，只將他和司機打死，小佛腿部中了一彈，倖免於難。楊杏佛壯烈犧牲，年僅四十歲。

人民為失去一位爭取人民民主權利的偉大戰士而無限悲痛。

宋慶齡尤其感到悲痛。她與楊杏佛很早就結識，十分賞識他的才智和膽略。作為一位愛國學者的楊杏佛，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中國同盟會，一九一二年擔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處收發組組長。同年十一月，赴美國留學，攻讀科學技術。是時正在美國讀書的宋慶齡認識了楊杏佛。楊杏佛傑出的才華，崇高的思想贏得許多留美女學生（包括宋慶齡及後來成為楊夫人的趙志道）的好感與欽佩。²⁴⁹一九一八年楊杏佛從哈佛大學畢業回國後，鼓吹「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執教於東南大學，不久以其主張遭排斥而被迫辭職。一九二四年十月，奔赴廣州，再次跟隨孫中山，擔任秘書，與宋慶齡開始直接交往。十一月，又隨孫中山、宋慶齡離穗北上。孫中山逝世時，被任命為治喪籌備處總幹事，主持喪事籌備工作，

248 宋慶齡：《為楊銓被害而發表的聲明》，載《宋慶齡選集》第七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249 胡蘭畦：《難忘的記憶》，未刊稿。

顯露出處理實際事務的非凡才能，給宋慶齡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兩人的友情日增，共同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秘密成立，楊杏佛被選為執行委員，主持策應北伐軍的工作。翌年三月，他配合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勝利後被選為上海臨時政府常務委員。蔣介石「四一二」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人時，他與武漢的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相呼應，進行反蔣鬥爭，以中國濟難會的名義，極力接濟和營救被捕的革命者，觸怒了蔣介石，被撤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的職務。一九二八年國民黨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長，他任總幹事，秘密參加鄧演達組織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與鄭太朴、謝樹英等負責中央直屬區的工作，擔負爭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層人士和教育界人士的任務，經常來往於上海和南京之間，同時也與宋慶齡聯繫。

鄧演達遭蔣介石殺害後，楊杏佛與宋慶齡更加靠攏，他們進一步認清蔣介石政權的法西斯性質，以更大的勇氣和熱情投入到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中去，並共同發起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同盟存在的半年多時間內，楊杏佛作為總幹事，不顧個人安危，以頑強的精神和幹練的組織才能，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經常代表宋慶齡，奔波於南北道上，周旋於虎狼之間，成為宋慶齡得力的助手和同盟的實際主持人，深得宋慶齡的信任和進步群眾的愛戴。

「雪壓青松松更青」，宋慶齡沒有被嚇倒。她為紀念死者，更加勇敢地投入新的戰鬥。第

二天，她寫出了《為楊銓被害而發表的聲明》，高度評價楊杏佛為革命不畏艱險、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極度悲憤地痛斥反動派的可恥罪行，指出：「這批人和他們所雇用的兇手以為單靠暴力、綁架、酷刑和暗殺就可以把爭取自由的最微弱的鬥爭扼殺。這就是他們統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說明了他們整個政權的面目。」莊嚴聲明：「但是，我們非但沒有被壓倒，楊銓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價反而使我們更堅決地鬥爭下去，再接再厲，直到我們達到我們應達到的目的。殺害楊銓的劊子手們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會給他們帶來應得的懲罰。」²⁵⁰

二十日下午，宋慶齡冒著傾盆大雨，到上海殯儀館弔唁楊杏佛並參加他的入殮式。她「異常悲憤，講話語氣也很激昂。當一大群新聞記者（其中就有冒充記者的幾個特務）包圍著她的時候，她表示為此事已發表一篇聲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這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性暗殺，她不會被這種卑鄙手段嚇倒」。²⁵¹

與此同時，宋慶齡在完成楊杏佛犧牲後的善後工作中，又懷著對革命戰友的深情厚誼，照顧楊杏佛的家屬。她不僅從經濟上幫助他們安排生活，而且在百忙中關心楊小佛的學習和成長。在此後的幾年中，宋慶齡經常在星期日或假日約楊小佛到寓所一起吃飯，瞭解他的學習情況或同去看電影，有時帶上鮮花一同乘計程車到楊杏佛的墓地悼念。²⁵²

250 宋慶齡：《為楊銓被害而發表的聲明》，載《宋慶齡選集》第七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251 沈醉：《軍統內幕》第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頁，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252 楊小佛：《宋慶齡同志——我最尊敬的長輩》，載《解放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魯迅明知特務暗殺黑名單中也有自己，卻毫不猶豫，凜然參加了楊杏佛的入殮式。他面對敵人的刀叢劍樹，發出氣壯山河的聲音：「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²⁵³他非常欽佩宋慶齡的堅強不屈，在參加楊杏佛入殮式返家後，對周建人說：「打死楊杏佛，原是對於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們兩人是堅決的。」²⁵⁴

然而，同盟的其他成員就不一樣了。林語堂完全被國民黨的子彈所嚇倒，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說否則同盟的會員都將遭到暗殺」。²⁵⁵林語堂在大革命時期，曾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所以認識宋慶齡，大革命失敗後，任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處長，後參加「民保盟」負責宣傳工作。他從同盟積極開展營救革命政治犯開始就發生動搖。二月，「民保盟」公布了揭露北平監獄的匿名信。他在接到胡適攻擊宋慶齡及同盟的信後立即回應，主張「負責糾正」，並寫信進一步對胡適說：「你來函態度之堅決，使我們更容易說話。」²⁵⁶他貪生怕死，不敢前往殯儀館為楊杏佛送殮，認為「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不必招的，與其掉腦袋，還不如做順民」。²⁵⁷其他一些盟員，或離開上海，或流亡國外。在這種情況下，

253 魯迅：《悼楊銓》，載《魯迅全集》第七卷，第四百四十三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254 周建人：《哀悼宋慶齡同志》，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255 宋慶齡：《追憶魯迅先生》，載《魯迅回憶錄》第一集，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256 林語堂致胡適函（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257 林語堂：《〈翦拂集〉序》，北新書局一九二九年出版。

宋慶齡雖想繼續開展會務工作已不可能，蔡元培也只好宣佈辭職。

「民保盟」終於被迫停止了工作。但它存在短短半年之間，在中國現代歷史舞臺上演出了有聲有色、可歌可泣的一幕，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五、繼續保護共產黨人和革命同志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民保盟」瓦解後，宋慶齡決心把未竟事業進行下去，繼續營救並幫助被迫害的革命者和愛國者。雖然過去的許多合作者先後離去，她卻並非孤軍作戰。由於「民保盟」半年多來的戰鬥事蹟，宋慶齡得到中國共產黨更深的信賴和廣大中外朋友及人民群眾真誠的支持。而且，通過鬥爭中不斷總結經驗，她的鬥爭水準也有了提高。她不僅要抗議敵人的暴行，營救受害者，更要把工作做在前頭，避免更多的革命者受到逮捕，保護那些未受難者的安全。

當時，由於國民黨的特務活動日益猖狂，而共產黨又在王明「左」傾路線統治下採取一系列幼稚而魯莽的「革命行動」，以及容易暴露自己的工作方式，再加上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一些重要領導骨幹被捕後不斷叛變，出賣組織和同志，因此，上海黨組織受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到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春，中共在上海的中央、省、市、區一級的組織機構被破壞殆盡，大批革命者被捕或失去組織關係；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間，中共中央與上海、北平等各地組織之間，以及蘇區與白區之間的交通聯絡經常中斷。

在這種情況下，宋慶齡曾為接通一些關係，護送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安全轉移，保護共產黨和革命力量的發展，默默無聞地做了許多工作。這些工作由於是在那個非常時期極端秘密地進行的，沒有留下多少可供查詢的文字資料；宋慶齡本人又十分謙虛，不願意多提這方面的情况，因此很難全面而詳盡地敘述清楚。但是從當事人的一些回憶來看，宋慶齡在這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由於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何本根叛變，省委書記章漢夫、省軍委書記陶鑄被捕，六月二十日，省委機關遭破壞，看守機關的顧玉良、李一純被捕；上海地下黨又遭到一次嚴重的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處於危險境地。宋慶齡曾通過陳翰笙，設法幫助幾個共產黨員秘密離開上海，以免被捕。²⁵⁸

同年夏季的一天，宋慶齡約請美國大夫馬海德把兩位客人護送到一艘開往蘇聯的船上。馬海德完成任務回到診所不久，就接到宋慶齡打來的電話，稱讚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對他表示感謝。後來他又收到宋慶齡派專人送來的信，才知道他送走的是兩位重要的中國共產黨人。馬海德說：「當時，我因為能為中國共產黨辦點事情而高興；也因為我能取得宋慶齡同志的信任而驕傲。」²⁵⁹

一九三四年六月至十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和盛忠亮相繼被捕叛變，致使共產

258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格》，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259 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黨十多處機關被破壞，江蘇省委機關以及所屬部門和各區負責人先後均遭逮捕，只剩下一些基層組織和地下黨員仍在活動。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冬，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電臺又遭破壞，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失去聯繫。宋慶齡知道後，立即設法予以幫助，使其恢復電臺工作，並及時接通了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聯繫。²⁶⁰

宋慶齡為獄中的方志敏向中共中央傳遞信件，也是重要的一例。

方志敏是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第十軍的創始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他率領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途中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擊，於一九三五年一月被捕，轉輾被押到蘇州，與陳賡同獄。入獄後，他給中共中央寫了報告，然後設法把報告送給了魯迅，並給魯迅寫了信，希望魯迅邀約宋慶齡、蔡元培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向社會發動一個營救他出獄的運動。

當時，「民保盟」早已停止活動。魯迅考慮到當時嚴酷的形勢，認為如果發動公開的營救活動，蔣介石就有可能提前對方志敏下毒手，不利於共產黨正在秘密進行的營救工作。他勸方志敏利用敵人「勸降」的時機，寫下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經驗教訓，以利革命。方志敏接受了魯迅的意見，在獄中寫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文稿，並輾轉帶出去轉到魯迅手中。後來，宋慶齡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回答中共上饒地委和北京魯迅研究所的詢問時，告知

她曾為方志敏向黨「傳過幾次信」，「方最後給黨的信，是由人轉來再給黨的」，²⁶¹其中包括《可愛的中國》，最後都送到陝北黨中央。²⁶²

宋慶齡還十分注意保護革命者的家屬。除了前文提到的牛蘭夫婦的兒子、楊杏佛的家屬和孩子之外，還盡力照顧共產黨人的孩子。一九三二年底，劉少奇離上海到蘇區工作，其前妻何寶珍留上海充當江蘇省委的交通，後來不幸被捕，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那時正是上海的中共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的時期，無人照料他們的孩子毛毛。這個孩子就流落在上海街頭，受盡煎熬。有人就以劉少奇兒子的名義向宋慶齡申請救濟。宋慶齡知道劉少奇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工人運動的領袖，即不避嫌疑，親自批准按月發給毛毛撫養費。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五八年，劉少奇和王光美才從別人口中知道這件事。²⁶³

宋慶齡幫助白區蒙難的共產黨人，也沒有忘記在蘇區艱苦奮鬥的中共中央。江西革命根據地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前，曾有相當規模的發展，當時迫切需要建設印刷廠和印刷技術隊伍，以衝破國民黨的文化「圍剿」和新聞封鎖，把蘇區軍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宣傳出去。為此，宋慶齡親自派人到上海一些印刷廠去物色人選，慎重挑選，最後委派祝志承、蔡粟青等幾位同志去蘇區。祝志承擔任了蘇區印刷廠廠長，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在中國革

261 張珏：《「老人年」回憶宋慶齡》，載《紅旗飄飄》第二十七輯，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62 胡愈之：《繼承和發揚統一戰線——深切懷念宋慶齡同志》，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九日。

263 王光美：《永恆的紀念》，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

命的特點是農村長時期地包圍城市的情況下，宋慶齡為發動城市工人階級支援農村鬥爭做出了貢獻。

六、主持魯迅葬禮

通過一系列神聖的工作和「民保盟」時期的鬥爭，宋慶齡和魯迅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誼。宋慶齡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寫的《追憶魯迅先生》一文中回憶道：「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每次開會時，魯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時到會。魯迅、蔡元培和我們一起熱烈討論如何反對白色恐怖，以及如何營救關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學生們，並為他們提供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他們還為譴責法西斯暴行，一起到德國駐上海領事館提交抗議書；為保衛民權保障同盟的革命原則，與胡適的背叛行為作鬥爭，等等。所以，宋慶齡視魯迅為中國革命的重要支柱，十分關心他的安全和健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八日晚，宋慶齡和何香凝、魯迅、茅盾、史沫特萊等，應邀出席蘇聯駐滬總領事館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節的酒會。會上，宋慶齡和史沫特萊等勸說魯迅去蘇聯療養，魯迅回答說：「局勢瞬息萬變，我怎能獨自遠行？」婉言謝絕了她們的建議。

一九三六年五月底，魯迅病勢加重時，宋慶齡也在病中，她得知消息後非常著急，除特請

美國肺結核病專家鄧醫生赴魯迅寓所診治外，²⁶⁴又於六月五日給魯迅寫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信中稱魯迅為「周同志」。這是她當時很少用的稱呼，表示她對魯迅特殊的戰鬥友情。她說：「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厲害的消息，十二分的擔心你的病狀！我恨不能立刻來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腸的傷口，至今尚未復原，仍不能夠起床行走，迫得寫這封信給你！」她「懇求」魯迅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最後，她再一次誠懇地表示：「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²⁶⁵

這裡，宋慶齡對魯迅在中國和中國革命中地位的評價，與遠在大西北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是相接近的。而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在當時的中國、甚至中國共產黨（包括「左聯」中與魯迅共同工作過的人）內，並不多見。

宋慶齡時刻惦念著魯迅的病情。她憂心忡忡。不只一次地詢問馬海德治療肺結核有無新的方法和新藥。²⁶⁶當國內醫治無效時，她又與其他友人一樣，竭力主張魯迅去蘇聯治療。但魯

264 周建人：《哀悼宋慶齡同志》，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有的著述中說，鄧醫生是史沫特萊請來的，史沫特萊還參加了魯迅的葬禮。不實。據史沫特萊自己敘述，當時，她正在臨潼華清池廟裡，「動手寫我的一本新書」。十月二十日，魯迅逝世的第二天，她才從女友口中得知魯迅去世的消息。參見《史沫特萊文集》（一）第一百二十八頁。

265 《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原件影印，圖一〇五，文物出版社出版。

266 馬海德：《宋慶齡——我的革命導師》，《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迅認為他離開祖國、離開生活就無法戰鬥，因而沒有同意去蘇聯治療。後來，宋慶齡又設法安排，請魯迅到上海近郊江灣的葉家花園去養病。該地空氣新鮮，環境幽靜，適宜療養疾病。魯迅十分感激宋慶齡的關懷，但也由於不願離開戰鬥崗位，仍然沒有去。²⁶⁷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中共地下黨負責人馮雪峰於是日凌晨五點鐘打電話通知宋慶齡後，她立即第一批來到魯迅遺體旁表示深切的哀悼，並與馮雪峰、許廣平、周建人等商量治喪事宜，組成以她為首的治喪委員會。

鑒於魯迅革命的一生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治喪委員會決定，把魯迅的喪事辦成一個向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示威的群眾運動，一次反日大遊行。宋慶齡當場打電話給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總幹事胡子嬰，告訴她：「魯迅已經逝世了，魯迅的喪事由救國會來辦，而且要通過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宋慶齡在魯迅的追悼會上。

他的喪事來發動群眾，搞成一個群眾性的運動。」胡子嬰立即召集救國會幹事會，轉達了宋慶齡的意見，擬訂了一個方案：（一）組織民眾為魯迅安葬，並在棺材上覆蓋一面「民族魂」大旗，以表示魯迅是為了民族和國家而戰鬥的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大旗由白緞子作底，黑絲絨做成「民族魂」三個大字，由沈鈞儒書寫。（二）魯迅遺體安放萬國殯儀館，讓各界民眾瞻仰遺容三天。這是過去沒有過的。（三）發動各界救國會和民眾送挽聯，這些挽聯在出葬時作為儀仗。（四）送葬時唱悼歌，用《打回老家去》為曲子，填上悼詞。（五）安葬那天，由各界人士包括國際友人抬棺木。這個方案和宋慶齡的意見，在沈鈞儒主持的救國會理事會議上通過，然後很快貫徹執行。²⁶⁸由於馮雪峰和地下黨的同志不能公開地出面，治喪過程中一切重要的關鍵性的工作，全仗宋慶齡主持和承擔。宋慶齡親自陪魯迅夫人許廣平到萬國殯儀館選擇棺木，她考慮到中國和世界人民對魯迅的愛戴，拿出自己的數千重金，幫助購得一具上面鑲有玻璃的棺木，以便使千萬群眾得以最後一次瞻仰戰鬥了一生的魯迅遺容。²⁶⁹萬國公墓的墓地也是宋慶齡親自去選定的。

為了向中外反動派示威，治喪委員會選了一條經過公共租界和中國地界的出殯路線。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企圖破壞葬禮，以「防止擾亂社會秩序」為由，不准按原路線進行。宋慶齡

268 胡子嬰：《關於救國會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憶》，載《救國會》第四百六十、四百六十一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69 周海嬰：《沉痛悼念宋媽媽》，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大義凜然，挺身而出。她穿著一身黑色旗袍，左臂戴著黑紗，與沈鈞儒一道，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堅定地帶領隊伍前進。本來在租界裡是不准遊行示威的，這次是送葬，又由宋慶齡等中外著名人士率領，租界當局也不好阻止，國民黨反動派更不敢干涉。由於白色恐怖而沉悶了多年的上海，這一天，一支一萬多人的隊伍，浩浩蕩蕩進行了數小時的示威遊行，大家唱挽歌，呼口號，聲勢浩大，反映了群眾對魯迅的愛戴，也表示了人民的覺醒，這次出殯在上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魯迅下葬前，宋慶齡與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等都發表了演說。宋慶齡說：「現在魯迅先生死了，可是魯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們應當繼續努力。追悼魯迅先生，須效法先生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漢奸的精神，為民族求解放。」²⁷⁰

然後，大家莊嚴地注視著魯迅的棺木緩緩地葬入墓穴。葬儀進行中，宋慶齡始終緊緊地扶握著許廣平的手臂，鼓勵她從悲痛中振作起來，繼承魯迅的遺志，繼續戰鬥下去。

在宋慶齡、共產黨和許多進步人士的努力下，魯迅的葬儀團結了左、中、右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體現了魯迅不分派別、一致對外、聯合抗日的精神，向消極抗日的國民黨反動派和氣焰囂張的日本侵略者顯示了團結抗日、一致對外的威力。

此後，宋慶齡一直關心許廣平及其兒子周海嬰的生活。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剛剛勝利，

她從重慶抵達上海，就由廖夢醒陪同，到許廣平家中探望。後來知道他們生活艱難，便不時饋贈肉類、水果罐頭，以及其他禮品。當知道許廣平牙齒缺損時，她又親自寫信介紹牙醫安裝義齒。總之，從生活到醫療，宋慶齡無微不至地關懷許氏母子，如同當年關心魯迅一樣。

一九五六年，魯迅墓遷移上海虹口公園。與二十年前一樣，宋慶齡仍然站在許廣平身旁，緊緊地扶著她，參加了莊嚴肅穆的遷墓儀式。照相機攝下了宋慶齡在兩次魯迅葬禮上與許廣平及周海嬰在一起的照片，生動地體現了宋慶齡對革命、對同志、對朋友，始終如一的深情厚誼，以及對魯迅的無限敬仰。

